

走東方自己的現代化之路？

● 裴毅然

1997年，香港學者金耀基先生談到香港文化，涉及中西文化衝突與融合的問題，提出一則很有意思的命題^①：

亞洲的現代性，是不是一定是西方現代性的翻版？……歐洲是人類歷史上第一個現代性的「個案」，那麼今後會不會出現不同於西方的第二個「個案」？這是目前學術界所關心思考的大問題。……我相信西方現代性之外，還有別類的現代性之可能，亦即現代性是「多元的」。

如果能走東方自己的現代化之路，還有一大誘惑——「矯正西方社會在現代化過程中出現的種種缺失」^②。取西方之所長，避西方之所短，踏着西方的肩膀站得更高，起點更佳，難道不是「太好了」？

從理論上來說，西方的現代性當然只是「個案」——條條道路通羅馬，東方也會現代化，哪裏只有你西方「華山一條道」？東方的現代化之路完全可以走出自己的「個案」。金先生正

是基於這一邏輯起點，提出希望能走出東方式現代化之路。不過，請注意，這只是存在於理論上的可能，邏輯上的自洽並不等於與人類普遍經驗相吻合，更不等於與現實可能相對接。目前，我們東方所面臨的現實是：既然西方提供許多現代性原則與成功的範例，而且還都是經過長達近四個世紀實踐檢驗與不斷校正的現成方案，凝結着豐富的正反經驗，我們又何必捨易就難另費周折呢？我們為甚麼還要為追求自己的「個案」再冒風險呢？捨既有覓新創、捨可靠就風險，社會模式改革這樣的大動作可不是小模小樣的小實驗，可逆性甚小，成本甚巨，東方人會這麼僅僅因為嘗試一種理想而重起爐灶麼？鮑彤先生在〈中國特色和中國道路〉一文思考^③：

發達者，走在前面也。「西學」者，迄今已知之人類進步的共有的基本道路也。放着已知的道路不走，偏要諡之為「全盤西化」，加以封殺，另外再去

開闢未知的路，拿老百姓當試驗品，我想不通。

眾所周知，一種新式社會制度的成熟與校正，本身就是成本巨大的社會化大工程。1640年英國革命以來，人家西方已經交了三百六十餘年的學費，才得今日之正果。如果為了自己的「特色」，我們另闢蹊徑另蹚新路，再交自己的學費，將一代或數代人的生命歷程投入「特色」試驗，有這個必要麼？從操作性上，有這個可能麼？東方人會這麼選擇麼？創新之時即易偏之日，有了最近一個世紀全球革命史的慘痛教訓，對於「創新」可是有了真正的切膚之識。「告別革命」之所以成為新世紀之初的「時代最強音」，即認識到急躁的冒進還不如穩健的保守，認識到繼承前輩經驗遠比顛覆一切的革命更重要，認識到一切創新必須建築在繼承的基礎之上。繼承第一創新第二，這可是用了一個世紀的巨大代價才換來的「世紀人文遺產」。

事實上，從東方各國現代化之路的現實來看，日本、港台、印度、新加坡等國，雖然意識形態方面有一點自己的東西，然而政治制度的基本模式仍然是三權分立、多黨競爭，經濟秩序跳不出市場競爭，社會公共事務以公開性與程序性為進入現代化的重要標誌。畢竟，理論上的美好設想無法代替社會現實自身的規律——每一發展中國家必然尋求最短的現代化路徑，必然選擇代價最小的入徑。再說，西方近代文明也是全人類的共同財富，以西方的經驗澆灌東方的土地，人家又不收我們版權費，不用豈不可惜？

當然，從另一方面，我們能否既不付出自身文化傳統的代價，又實現國家的現代化呢？希望通過保留傳統，將傳統中的美好東西加入現代化，將我們的社會安排得更美好、更文明、更合理，產生這樣的想法與追求，固然十分自然十分可愛，尤其對已經成為古老文明孤本的中華傳統文化，國人產生這樣的審美設想，更是有着相當的必然性。但這份美好只能存在於理論層面，成為我們走向現代化時對傳統文明的一種回顧。像甘地(Mahatma Gandhi)這樣為保衛印度文化而全面抵禦工業化，如今看來是行不通的，也是毫無意義的頑固行為。一種文化系統的存在必然以相應的生活方式為依託，當這一生活方式淡出現實生活舞台，當新的生活方式挾着新文化一起來臨，成為新一代人的必然選擇，與舊生活方式相聯繫的舊文化便只能入住歷史的壁龕，無法再佔據原有的中心位置。作為東方人，保衛東方文化自是天職，也很容易激起一種文化責任感，但這種保衛決不能以抵禦西方現代文明為前提，決不能以人家西方現代文明為假想敵，只能在繼承消化西方現代文明的基礎上，逐漸尋找東方傳統文化與西方現代文化的結合點，而不是刻意尋找兩者之間的歧異之處。

戊戌以後，對中國現代化道路的選擇成為寰內士林一大議題。1905年東京大辯論維新派敗陣，「棄改良擇革命」的選擇，事實上已決定了二十世紀中國現代化道路的大走向——走激進之路，走超越式發展道路，以期規避和超越西方資本主義的種種既有弊端。五四時期，「主義」蜂起，旗號林立，然均以浪漫主義為邏輯底座，

並無任何實證經驗支撐。百年國史無非再次演繹那句名諺——欲速則不達。這樣，當浪漫主義落潮後——「革命的總發條鬆了」，保守主義便再次不可阻遏地勝利升起大旗，成為閃閃發光的經典。

今天，我們的警惕自然高多了，尤其對那些來自浪漫主義一側的口號。其實，那些被叫得山響的口號——「××主義」、「××道路」，連呼喊者、舉旗者自己都搞不清其內涵與實質。與其花費精力去論證、去試驗這些不大可靠的新設計、新規劃，走浪漫主義道路，還不如持守內容明確、概念清晰、範例現成的「保守」，走現實主義道路。先學習西方，繼承西方，然後再去考慮如何修正人家，超越人家。像「大躍進」這樣的窮過渡，企圖十至十五年趕英超美，還不是一個大笑話，一場最無知也最沉重的歷史鬧劇。

一般認為中西方文化在香港融合得相當不錯，十分和諧，因此香港具有十分強烈的國際化性格。金耀基先生也承認：「現代性是與文化緊密聯繫的。……世界是越來越趨向一體化了。」^④香港開埠僅僅一百多年，經濟已居世界前列，香港人均收入已超過英國。如果走自己的路，能成就這一「美麗的錯誤」麼？

因此，現代性的東方「個案」雖有理論上的意義與可能，但在現實中是很難形成的，也很難被選擇。理論上的「可能」與現實中的「可行」，差距甚遠。當然，如果「走東方式現代化之路」僅僅是指對西方現代化模式的局部修正與必要補充，摻加一些當今的東方元素，如適量滲透儒家文化的因素，考慮東方傳統的價值觀念，設計

一些過渡性政策措施等，而非扒屋拆架重起爐灶式的另闢蹊徑，自然十分「要得」，也是應該的。只是，扯起「東方式現代化」的大旗，帶有方向性根本性的號召，相當於五四時期的「主義」，似應謹慎再三。而且，甚麼是「東方式現代化之路」，具體內涵為何？有何區別於西方現代化的「標誌性建築」？莫非即指當今的「專權制＋市場經濟」，即東方的政治專權與西方市場經濟的跛腳結合？兩種完全不同型號的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能完美配套麼？專權的政治能為市場經濟提供真正的自由麼？事實上，內涵模糊不清的「東方式現代化之路」已成為拒絕民主化政治改革的理論防空洞，為當下單邊跛行的現政策提供了邏輯防護膜，即認可政治專權的必要性。這些，都不禁使我對「東方式現代化之路」疑懼重重。

註釋

- ① 劉夢溪對金耀基教授訪談錄：〈為了中國現代文明秩序的建構〉，載金耀基：《中國的現代轉向》（香港：牛津大學出版社，2004），頁222。
- ②④ 侯軍對金耀基教授訪談錄：〈世紀回眸：從香港文化看中西文化的衝突與融合〉，載《中國的現代轉向》，頁248；255。
- ③ 鮑彤：〈中國特色和中國道路〉，載《中國的憂思》（香港：太平洋世紀出版社，2000），頁143。

裴毅然 復旦大學文學博士，上海財經大學人文學院教授，著有《中國知識份子的選擇》、《二十世紀中國文學人性史論》等。